

# 天童禅文化之日常意义

包丹虹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将拍摄《天童寺》纪录片，分上、中、下三集，每集时长36分钟，共计108分钟。日前，该片主创人员专程来宁波考察，拍摄“天童寺”，无论是题材的特殊性，还是从卷帙浩繁的佛教历史文化来看，这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那天我应邀参加了东吴镇召开的关于天童寺的研讨会。作为凡俗之人，我谈不出佛学的深刻奥义，也理不清禅宗“南能北秀”“临济、曹洞”宗派之脉络，拍摄不出像大雄宝殿那般框架。好在研讨会就是让人集思广益，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借用王安石描写天童寺的诗句“青山捧出梵王宫”，这便是胸怀与智慧的大境界。

那天我发言的题目叫《从荣西的〈吃茶养生记〉追溯日本茶道文化的渊源》，主题切口小，但很日常。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喝茶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普遍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所谓开门七件事，喝茶就是其中之一。而中国又是茶的故乡，与丝绸、瓷器一样，茶在国际上是一个识别度很高的中国符号。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把茶叶誉为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

现在闻名于世的日本茶道，就源于中国古代寺院。

赵朴初先生喜欢喝茶，常以茶入禅诗，其中《吃茶》：“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巧妙化用唐代诗人卢仝《七碗茶歌》的诗意，并用“吃茶去”这一中国人以茶待客的惯用语和出典于唐代高僧从谏的禅林法语，贴切而生动地写照出“茶禅一味”。而他的题诗《中国——茶的故乡》：“东瀛玉露甘清香，楞伽紫茸南方良。茶经昔读今茶史，欲唤天涯认故乡。”从赞美日本玉露茶、斯里兰卡紫茸茶入手，最终道出它们都根系中国的土壤。

荣西禅师在日本被尊为“茶祖”，他与天童寺有着深厚的佛缘，这是我在一次日本旅游中探索而知晓的故事。

当时，我在静冈下飞机，坐上大巴沿途过去，映入眼帘的满是绿油油的茶叶树。令人诧异的是我们平日所见的茶叶树，大多

种在层层梯田似的山坡上，而日本那边像种稻似的长在地上。原来静冈县是日本的茶叶基地。径山茶籽就是由圆尔辨圆禅师通过宁波海上之路带回，种在自己故乡的。

2003年，宁波组织了一个“海外寻珍”团，在日本考察时发现几株高龄茶树，经专家们考证后推测，茶树籽来自浙东，甚至可能来自宁波。这个推测很快得到了印证，日本的中国茶文化评论家工藤佳治在《日本茶文化和宁波历史渊源的探求》一文中，明确表示宁波是日本茶文化的源头。而且，宁波是“海上茶路”起航地。这些甬城媒体都曾作过报道。

在日本的奈良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唐代，禅宗茶道已经形成，那时日本的遣唐僧人是中国茶道传



天童寺一景 (包丹虹 供图)

入日本的重要桥梁。到了宋代，喝茶被称为“和尚家风”。日本临济宗的开创者荣西，两度入宋研究禅法，那正是禅宗茶道发展的鼎盛期。荣西在天童寺学佛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寺院的生活方式。回国时，他除了带去佛教经典之外，还带去了茶树种子。他除了自己种，还把茶籽送给京都高僧明惠上人。明惠上人在尾山上种出了日本闻名遐迩的“尾茶”。

荣西将茶的种子和种茶、制茶及点茶的方法技术传到了日本，并写下影响广大的《吃茶养

生记》，此书相当于中国陆羽的《茶经》，在本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属于里程碑式的著作。

顾名思义，《吃茶养生记》就是“饮茶、养生健体的方法”。书里不仅写茶的功效，也提到了丁香、桑、沉香、青木香等中药。荣西曾经在前往天台山的路上，因天气炎热而中暑，后经茶店主人救助，喝了由丁香熬制的茶水而得以恢复。回国后，他也以同样的方法帮人。当时镰仓幕府的源实朝将军正患热病，荣西便将从中国带回的茶叶献给他，并教他茶疗法，使他恢复了健康。自此，茶风更为兴盛。

日本的大学教授高桥忠彦对荣西这一茶文化著作有过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说：“《吃茶养

生记》。其实，抹茶起源于中国隋唐。那时人们出于保存需要，将春茶的嫩叶用蒸汽杀青后做成饼茶或团茶，在食用前再进行烘焙，并用石磨碾成粉末。

不仅日本的抹茶起源于中国，而其茶道精神“和、敬、清、寂”，也明显带着中国佛教思想的烙印。《吃茶养生记》将茶称为“仙药”，是因为有“佛的加持功效”，带着一种神秘感。而茶确实有提神困倦的功效，有助于僧侣们专心修行。

禅，是这次研讨会上的一个高频词。什么叫禅，《辞海》的解释言简意赅：梵文“禅那”的略称。意译作“思维修”“弃恶”等，通常译作“静虑”，也就是“禅定”。禅定，系佛教修行方法之一，就是

“安静而止息杂虑”的意思。佛教修行者以为静坐敛心，专致一境，久之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禅，是一个带有宗教意义的用词，但它更蕴含着一种生活哲理。且不高论禅文化如何促进世界大祥和，于我们日常而言，若能够在喝茶时反省一下自己，纠正错误思维、去恶从善、博大胸怀，从而获得心灵的清静安宁与开阔，这样，世事即便再纷繁，人生即便再忙碌，也能从容超脱得自在。

## 黄易： 武侠小说的流风余韵



清宸

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黄易本月5日因中风去世，享年65岁。对于这位作家，很多人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寻秦记》和《大唐双龙传》这两部作品中。因为黄易先生的诸多武侠小说，唯有它们被改编拍摄成了电视剧，广为传播。其实对于黄易先生的成就，坊间评价并不一致。喜欢他的，称之为“一代宗师”。不喜欢的，觉得他文字平平，人物形象单薄，情节线索纷乱，无用的叙述和描写随处可见，整体水准与金庸、古龙两位有着霄壤之别。然而文学审美，本就无需整齐划一。总之：风格是他们的，选择却可以是我们的。

黄易先生对武侠小说自有他的功绩。黄易先生本名黄祖强，因好玄学，喜《易经》，后改名黄易。他在香港大学毕业后，本是从事中国传统绘画的，后来弃丹青，从翰墨，完全源于对武侠小说创作的热爱。黄易1989年辞职后开始隐居写作。那是武侠小说从黄金期渐渐走下坡路的时代——1972年，金庸写完《鹿鼎记》后封笔；1984年，梁羽生亦封笔；1985年，古龙驾鹤。同时，各种强势传媒和流行文化占据市场，武侠作品渐渐鲜有人问津了。黄易先生选择这个时候写作武侠作品，分明有一种知难而进的意思。他说：“那时候武侠小说真是像被判了死刑一样，但我唯独有一个人不相信，那就是我。”

黄易先生从此笔耕不辍，据说两个星期能写出八万字，可以想见是一种怎样的勤奋和艰辛啊！而他的作品也有不少“大部头”。如《大唐双龙传》，1996年起在杂志上连载，直到2001年才完结。全套63卷，共435万字。笔者印象中，篇幅上能与之比肩的大概只有张炜先生获茅盾文学奖的那部《你在高原》了（全书450万字）。黄易先生还自己成立出版公司，陆续出版《覆雨翻云》《大剑师传奇》《时空浪族》《寻秦记》《破碎虚空》等作品。2012年，先生“重出江湖”，写了部《日月当空》，创下黄易小说在大陆销售的历史纪录。

然而，武侠小说想要再度辉煌，谈何容易。黄易先生想到的方法是出奇出新，并由此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武侠+X”创作模式。这个“X”是什么呢？黄易用作品告诉读者，“X”并无定义，它可以是科幻、穿越甚至情色。有鉴于此，有人认为现代网络中文写作的很多题材就是从仿效黄易先生开始的，这个观点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两者层次有别。黄易先生当初对“穿越”情节有过自己的考虑。他的创作意识中存在一个跨类型结合的理念。他觉得“穿越”就是打破了线性时间，堪称是一种超越了生死轮回的“道”。他作品中的一些角色，往往不会执着追求绝世武功，而是认定武侠的最高境界为“藉武道窥见天道”。这样的立意和现在网络上的快餐写作大相径庭。且看黄易先生的《寻秦记》，讲述的是男主角项少龙从一个现代社会的反恐专家穿回秦朝，不断打怪升级的故事。项少龙的穿越方式不是什么病危或车祸，他有专门的工具——“时空穿梭机”。可能有读者在看到项少龙的儿子叫“项羽”时，会看不想去，觉得这纯粹是乱话三千。但这就是黄易先生的风格，无拘无束，无远弗届。他作品里包含的元素也极其庞杂：爱恨情仇、术数丹学、仙道玄说、经脉理论、琴棋书画、宗教哲理，天马行空，驰骋万里。《大剑师传奇》把读者带到了异世大陆，《星际浪子》营造了浩瀚的未来太空，《边荒传说》充满生命的哲思，《覆雨翻云》则大胆探讨虚空破碎的可能。他的武侠创作就是这般“任性”！

黄易先生作品所带来的辉煌是武侠小说走到自己固有历史时期后一次令人欣喜的空白填补。这就好比唐诗到了晚唐，流风余韵虽在，和烈火烹油的盛景到底不能同日而语。武侠圈子里流传：“金古梁温黄，武侠万年长”。其实呢，今天的武侠一定程度上早已脱离了文学本身，转而是由改编而来的影视剧进行着“扫盲”般的大众传播。因为那里面一样能展现江湖恩怨，武林纷争，更兼种种影视科技带来的视觉效果冲击。如此，笔者反而更加钦佩黄易先生了。他长年的伏案疾书真是凭一己之力，拓展了武侠创作的境界。而且，他是有情怀的人，带着点这个时代下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他对武侠有信心，对文学有信心。他觉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武侠，所以武侠不会消失……

鉴赏与收藏

## 贺天健： 一位值得关注的山水画大家



贺天健

方向前

贺天健是一位与吴湖帆相峙海上画坛的海派大家。

民国海上画坛，名家辈出，风格迥异，在山水画上执牛耳者，其时当数吴湖帆与贺天健。两人在画坛上“一文一武”：吴湖帆婉约清腴，贺天健雄奇苍莽。在近几十年艺术市场上，吴湖帆作品极受藏家追捧，价格已进入第一板块行列，而贺天健作品的市场价值与艺术价值却严重背离。

纵观历史，许多画家在世时不被社会认可，甚至死后几十年默默无闻，如近代大家陈子庄、黄秋园等，都是死后才被世人所重视。黄宾虹在世时，其“黑乎乎”的画不为人欣赏，而在近二十年里，他的书画作品“异军突起”，进入近现代书画艺术市场第一板块的行列，现在要收藏一件黄宾虹的绘画作品，

已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贺氏作品在世时已有很好的市场价值，只不过近几十年来，市场未给其应有的价值匹配。这值得人们思考。

贺天健在现代中国画坛的地位和影响极大，他是新中国继齐白石之后，被欧洲画会吸纳的成员，被丹麦美术界誉为“水墨画大师”；1959年作品《东风吹到好江山》参加世界美术博览会，荣获一等奖；同年受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创制《河清可俟图》巨幅；1960年受聘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曾任上海美协副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职。

“艺术贵在创新”，贺天健所特有的“贺家样”奠定了他在近现代画史上的地位和学术价值。民国海派山水，在营造多元风貌上，首推黄宾虹和贺天健两家，贺天健在创作实践上秉持“师法五代北宋的法度精神”，注重“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与“生活体验与创作”，为海上画坛婉约秀美的“吴家山水”注入了恣肆劲健的豪迈之气，一度引领海上绘画，成为与傅抱石为代表的“金陵画派”、溥心畲为代表的“京派”等，丰富了中国画语言的表现形式，独树一帜，名享海内外。

贺天健是一位“用脑画画”的艺术家，也是一位画学研究

与创作实践中的三位大家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贺天健成功创作了巨幅金碧山水《锦绣河山》，此作展出后反响极大，黄宾虹撰文道贺，傅抱石在《人民日报》撰著长文：“古人说‘书画可以论世’，但论世足以知人，贺老所具有的笔墨基础相当深厚，其作品足以反映新时代……”并誉之为“是继四王后三百年又一个山水画的整理者和集大成者”。贺天健也获得了当时美术界、文化界同道黄宾虹、傅抱石、邓拓、王朝闻、蔡若虹等大家的高度评价。“他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贡献是相当重要，是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画家。”——当代美术史论家邵洛羊先生把贺天健的山水画推举到极高的位置，列为与黄宾虹、吴湖帆、张大千、陆俨少等相同的地位。

贺天健的书画在世时已很有市场，与当时上海滩吴昌硕、王一亭的画价可比肩，短短数年，润格一涨再涨。其一生创作态度精益求精，存世作品量少，据行内估计仅存千余件，其中有多幅入各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收藏。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但在书画市场中，存世量少在某程度上也会影响市场对画家的关注度，削弱画家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贺天健过世后，其作品价值最早是在香港书画市场被发掘和宣传的，20世纪80年代，贺氏作品开始进入海外拍卖市场，1982年他的一幅山水作品（115×46.5cm）在苏富比以2.5万港元成交；1990年《漓江滩水乡生活图》（90.5×43.8cm），在苏富比以17万港元落槌；1999年，巨幅山水《北国风光》（作于1993年，150×358.5cm），在嘉德拍卖会上以57.6万元成交，创其作品的当时市场最高价。时过17年，《北国风光》再次在2016年嘉德秋拍重现，以680万元起拍，805万元收槌。这件近五十平方尺的巨幅山水，全用唐人全碧晕染之法，气势磅礴，极为壮丽，可称贺天健第一，拍出这一价格，应该说是市场低估了。同年嘉德秋拍，山水《五泄湾头》（创作于1935年，121×40cm），60万元起拍，80.5万元收槌。

一般来说，艺术家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是相符的，但在市场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偶尔也会出现两者相背离的状况。笔者认为，贺天健就是其中一位，他完全有理由进入目前艺术市场的准高价板块。贺天健是一位“汲古开今，与时俱进”的中国画大家，值得藏家关注。



贺天健山水作品

(方向前 供图)